書 評 序 言
考古人類學刊・第 76 期・頁 135-138・2012

新世紀人類學研究的新挑戰

黃 應 貴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

人類學正如其他社會科學一樣，若不能處理它所處時代的問題，勢必失去其存在的理由而為該社會所遺棄。但另一方面，這樣的挑戰，往往也是人類學或社會科學有所突破的契機。譬如，在 1960 年代末期，由於族群、性別、階級等的社會不平等問題，導致歐美及日本已開發國家普遍性的學生抗議運動。為解決這類社會問題乃導致人類學中結構馬克思理論及政治經濟學理論的興起，進而使人類學知識本身的發展有所突破。同樣，在台灣，1960 到 1970 年代，是台灣社會由農業社會進展到工業社會的轉變階段。由於這種轉變所帶來的工業化、都市化適應及農村沒落等社會問題，是台灣社會過去所沒有的。因此，所有的社會科學對於這轉變所帶來的新現象與新問題，都很陌生而難以掌握或處理。只有人類學因透過田野工作而有第一手的資料與經驗，最能夠點出當時問題的所在且提出相對應的獨特策略，使得人類學得以在當時所有社會人文學科中，成為最受人重視的一門學問。而這段時期也是人類學在台灣社會發展至今的過程中，最為輝煌的年代。

然而，國際人類學經過 1980 年代的後現代及全球化挑戰後，到了 1990 年代，開始直接面對全球化背後新自由主義力量所導致的現象與問題。經過了將近二十年的努力，不僅人類學，整個社會科學也幾乎沒有太大的突破。甚至到了 2008 年發生了全球性金融風暴，至今不僅還無法復甦，第二次衰退的陰影仍揮之不去。在這樣的情境下，不只台灣的人類學者，整個國際人類學界也焦慮異常。譬如，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人類學系，今年就出版了一個新的網路期刊 *Anthropology of This Century*，對最近出版的人類學著作中有關當代課題的作品進行評介，來尋求能有效再現及處理當代新現象與新問題的新觀念，以便有所突破。

不過，即使在當前缺少大突破的瓶頸下，還是有一些具有前瞻性的研究成果，透露出一些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的新挑戰。本專題書評所包含兩篇較長的書評，就是試圖透過新書介紹引介大家注意一些具有未來前瞻性之新想法的作品。第一篇有關多元的世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人類學，主要的觀點是非西方社會的人類學，經過上個世紀的努力，大都已成熟到一定的程度而能自行發展，也都意識到各自文化的價值與文化間際性（interculturality）的重要性，而開始朝向各自社會所關懷的問題或累積的成果來努力，試圖以其獨特的成果來貢獻給屬於全人類且是複數的世界人類學（world anthropologies）。即使今日在新自由主義全球性發展的趨勢下，每個社會也會因過去的社會發展與歷史經驗上的差異，使得新自由主義在世界各地的發展有各式各樣的面貌呈現，也帶來形形色色的問題。因此，葉文介紹的 G. L. Ribeiro & A. Escobar （2006）所主編的 *World Anthropologies: Disciplinary Transformation within Systems of Power* 一書，便針對 12 個國家或地區人類學當下的發展進行討論。詳情請參閱葉文。在此僅補充一點，拉丁美洲國家從 1980 年代開始，因已開發國家透過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組織的借貸方式來強迫他們執行新自由主義化政策。由於這些拉丁美洲國家大都經歷過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對於這類由上而下的新自由主義化有強烈的質疑，因而引起劇烈的社會抗爭。到了 1998 年，委內瑞拉總統 Hugo Chavez 乃提出中間偏左的新路線，以解決新自由主義化經濟與社會間的衝突。隨後拉丁美洲的智利、巴西、阿根廷、烏拉圭、玻利維亞、尼加拉瓜、厄瓜多爾、巴拉圭等均加入此路線，創造出不同於北歐及英德的「第三條路」。這當然不只是當地人類學家努力的結果，也是當地社會科學家及社會大眾一起協力的成果，更是各種文化互動的結果。反觀台灣社會，至今政府及學界不僅對於台灣社會的新自由主義化趨勢幾乎完全忽略，更看不出台灣社會的關懷為何而無法找出台灣人類學研究的方向與希望。就如仍陷於西方中心/非西方邊陲結構之困境的國家一樣，台灣人類學界未來將何去何從是需要深思和努力的當下課題。

相對於葉文的多元世界人類學，鄭文則落實到具體問題的討論：親屬。對人類學者而言，親屬是個令人既愛又恨的研究領域。在所有社會科學當中，大概只有人類學家能具備如此系統而繁多的親屬理論來處理相關的現象與問題。這對於研究親屬制度往往具有支配性的非西方社會之人類學家而言，這套知識往往讓他/她不同於其他社會科學家。但自從 David Schneider 批評人類學的親屬概念根本是來自西方的親屬觀念之後，人類學家對於親屬研究的興趣便一落千丈。加上非西方社會的親屬制度，在現代化過程，往往隨著世俗化的發展而沒落，如此更加速親屬研究的沒落。雖然 1990 年代之後的人類學，透過對於當地文化的深入的理解，重新提出 relatedness 等的親屬概念來研究親屬而有所復興，但仍不復以往的榮景。然而，到了這個世紀以來，隨著新自由主義的全球性發展，非西方社會原有的社會組織，包括自願性團體（如工會）乃至於國家，不僅沒落，甚至瀕臨破產。因此，原在不同程度內擔負起西方社會的社會福利及社會保險功能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社會組織瓦解後，非西方社會的人民只好重新尋求親屬關係作為最後的依賴與希望。加上人工生殖技術的發達，使得西方社會原有的親屬關係也產生問題而重新浮上台面。是以，這世紀以來，親屬研究乃重新站上人類學研究的主要舞台。然而，這波人類學親屬研究的再興起，仍然隱含親屬在非西方社會所具有的不同關懷及不同文化意義、甚至是本體論上的挑戰。鄭文所提及亞馬遜地區 WaiWai 印地安裔的人類學家 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 的親屬研究所引起的反應，主要便是屬於後者的本體論挑戰，詳情請參見該文。筆者在此要補充的反而是在新自由主義發展的條件下，親屬研究在非西方社會的關懷，往往是超越「親屬是什麼？」的知識論興趣，而是在探討社會的性質，以便解決新自由主義化的當代情境下個人存有之困境。故我們可以發現當代研究日本家的日本學者，如上野千鶴子、目黑依子、落合惠美子、山田倉弘等等，所關懷的是在日本社會中資本主義新發展的趨勢下，因社會性質的改變而塑造出家的新性質與新樣態下，來面對社會及人存有的問題。但西方學者看待他們的研究時，卻還是停留在日本的家原有的前提下，來看哪些因素造成家的改變。譬如 R. Ronald & A. Alexy（2011）所編的 *Home and Family in Japan: 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便是典型的例子。如此不同的關懷更突顯出葉文所強調的多元世界人類學的意義所在。希望這兩篇篇幅較長的書評，能對台灣人類學未來的發展提供另一種選擇的思考機會。故筆者願意將它們合在一起構成一個「新世紀人類學研究的新挑戰」專題書評來發表，並做一些說明，以便有助於讀者的理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考古人類學刊・第 76 期・頁 135-138・20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